

张博泉先生七十寿辰纪念

遼金史論集

第八輯

于志耿

王可賓

主編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博泉先生七十寿辰纪念

辽金史论集

第八辑

干志耿 主编
王可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前 言

张博泉先生是我国著名金史、东北史专家。自1954年发表关于拓跋魏租庸调研究的专文以来，四十年间一直致力于金史、东北史的研究和教学，笔耕不辍，著述宏富，为用唯物史观研究金史、东北史披荆斩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金史简编》、《东北地方史稿》正是新中国成立后，金史、东北史的首部专著。他培养的学生，也正是这一研究领域的英才。近年来，博泉先生又赳赳乎超越断代史，地方史的范畴，提出了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新的史学思维，命题为“中华一体论”。此已为学术界所共知。最近几年，他又撰著、主持编著《金史论稿》、《女真新论》、《鲜卑新论》、《女真史研究》、《箕子与朝鲜论集》、《中国地方史论》和《中华一体构成概观》等，把金史、女真史、东北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科学研究事业推向又一个高度，作出了新的贡献。

今年欣逢博泉先生七十华诞。前年以来，于永玉、王可宾、程妮娜、刘庆、都兴智、傅百臣、韩世明、安丽春、任万平、吴凤霞、贾恩祥诸人，筹措出一庆祝文集，飞柬邀约，以永志先生业绩。蒙舒焚、杨树森、李健才、孙秀仁、宋

目 录

前 言	(1)
古风四首颂吾师张博泉先生七十华诞	孙秀仁(1)
贺博泉教授七十寿辰	张璇如(2)
勤奋治学 全心育人	程妮娜、都兴智、武玉环(3)
锐意求索 开拓创新	杨 军、韩世明(10)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范寿琨(16)
一件启我心扉的往事	李兴盛(22)
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宋德金(24)
二千年前我国在黑龙江的建置——真番郡	孙进己、于志耿、孙长庆(45)
八九世纪东北亚国际关系评述	魏国忠(64)
关于渤海国上京迤北交通道	孙秀仁(77)
试论辽圣宗时期的社会改革	黄凤岐(84)
浅说辽代孝道和忠君	杨树森(103)
辽代北疆开发考论	孟古托力(113)
辽上京道州县丛考	冯永谦(130)
关于辽代宁江州州治所在地的讨论	李健才(155)
常胜军与辽宋金政权	都兴智(168)
辽金元东北建置的比较研究	杨 军(180)
试论文治武功在金代官政中的表现	程妮娜(196)

古风四首颂吾师 张博泉(在清)先生七十华诞

孙秀仁

辽海籍乌龙，东望首山霭。
寻津千里行，梅自苦寒来。

居室无长物，架书充四堵。
淡泊志高存，衣履惯麻布。

三

春秋频落笔，最著金源事。
伊洛贵何低，昭垂吾自知。

四

德欲干云峻，宽容褒后进。
景行仰止间，南响沾清润。

贺博泉教授七十寿辰

张璇如

夷家才子逍遥翁，积乐排忧耕读中。
东史续成初贯古，华论新出再称功。
身居斗室欣时政，心系宏图秉素风。
道德文章人竞仰，期颐琼宴寿醇浓。

。紫四衣中紫，紫衣衣室居

。亦和紫紫衣，紫高衣衣紫

三

。紫紫金紫景，紫紫紫紫紫

。紫自紫紫紫，紫自紫紫紫

四

。紫紫紫紫紫，紫云干紫紫

。紫紫紫紫紫，紫云干紫紫

勤奋治学 全心育人

程妮娜 都兴智 武玉环

张博泉先生，一名甫白，字在清，晚号东梁。满族，辽宁辽阳人，乙丑岁腊月十五日生。自1954年先后以尚钺、吕振羽两位前辈为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在吉林大学任教，现为历史系教授。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地方史研究室主任，吉林省东北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和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先生长期从事金史、地方史、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是著名的金史专家和地方史专家。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为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领域，输送了诸多人材。先生勤奋治学全心育人的事迹，一直在激励和鞭策我们前进，喜逢张博泉先生70华诞在即，谨记述先生治学育人二三事，以为自勉。

1955年《新史学通讯》发表的《谈谈对租庸调制的看法》，是先生的处女作。自此以后40年来，先生兢兢业业倾注全部精力，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撰写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国边疆史研究》、《文史哲》、《史学集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百数十篇论文外，先后出版的著作有：《金史简编》、《金代经济史略》、《金史论稿》一、二、三卷（主持合著）、《东北地方史稿》、

《东北历代疆域史》(合著)、《东北历史名人传》古代卷上(主编)、《女真新论》、《鲜卑新论》、《辽东行部志注释》、《鸭江行部志注释》(合著)。其中有的先后被评选为《光明杯》二等奖以及其他优秀图书奖。此外,早已交付出版社待付梓出版的有:《金史述要》(主持合著)、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女真史研究》(主编)、白寿彝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的金史部分,以及《中华一体构成概观》、《中国地方史论》(合著)。最近即将完成《箕子与朝鲜论集》。学问甚丰,著作等身。

先生所以能取得如此瞩目成就,皆来自于勤奋苦学。先生在50年代才开始问津史学,他曾谦虚地说:“我是半路出家,先天不足。”但事在人为,先生以超人的毅力,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勤奋读书,从约到博,由专达通。50年代末选定以东北古史为基础,以金史为主攻方向,旁及辽、宋和元,进而扩展到北方民族和政权乃至整个中国地方史的研究。如要完成这样一个既定任务,必须掌握广博的知识。先生不畏艰难,除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历史文献与论著外,还有重点阅读与之有关的经济、地理、民族、考古、古文学和古音韵的论著。因而基础丰厚、思想开阔、才思敏捷、硕果累累。有人说:“先生搞东西太快了。”先生则说:“这是错觉,无论写书还是写论文,我是慢得很。我都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进行史料搜集整理和理论酝酿。”先生有个习惯,读书时心有一得就及时把他记下来;日积月累,待资料充足,观点成熟,再把它写成论文;出了一批论文之后,方动手著书立说。成果出的虽快,岂知这中间耗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时间运行的速度是不变的,但它给予每个人的相对值却有多有少,这完全在于个人的利用和争取。先生曾对我们说,他年轻的时候,社会工作很多,政治运动也很多,留给他治学的时间却没有多少。为了抓紧时间读书,只好不睡午觉,这样每天就可挤出两个小时,一年就比别人多出二三个月的学习时间。直到现在先生还留

有不睡午觉的习惯。“文革”时，先生需要研读的历史著作大多被认定为“封资修”，而被封存起来，他就趁此时机进一步温读经典著作，增强理论的水平 and 修养。“靠边站”时，他到图书馆用小车借回一套又一套的金文甲骨专著，放在床底，整整啃了一年古文字。我们进入大学以后，无论是晚上、周日还是新年节庆，前去看望他，总是见到先生伏案疾读。在先生的书房里，我们还曾看到一本本用劣纸装订成册的笔记本，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 60 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所写的读书笔记，其中有的是史料择抄，有的是有关某个问题的论稿。先生的书房中还堆放着许多装得满满的文件袋，想必也都是装有不同专题的这类笔记。先生年轻时酷爱文学，但当他全心投入研究和著述之后，除了看看电视新闻之外，几乎无暇顾及他。平素家务也全由贤慧而善良的师母一人操持。每读时则忘却身外一切，即使有人到书房打扰，依然在沉默工作，这已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

争取来的时间，如何充分地有效地利用，也是个重要问题，先生对此有着严格要求。就以撰写著作来说，他在资料准备齐全，观点酝酿成熟，列出提纲细目的同时，也规定了每天的进度，严格遵守执行。如要写一部 30 万字的书，规定每天写 2000 字，遇事有所延误，在短期内也一定要补上。这样，5 个月便可写出初稿，再用半年修改，一年就可完成一部著作。

先生常对我们说：“时间要靠自己争取。学问如同大河，每条河都有诸多的源头，纳众水而成巨流。治学，决不能因循守旧，更要别辟蹊径。”记得 1990 年 6 月的一个周日，先生准备了丰盛的家宴，为即将毕业的研究生送行，在长春的他的几个学生也都前来相聚，席间谈起治学之道，先生说：“治学要经三新即从新、立新、创新。”

从新,就是研究观点要从新,方法也要从新;立新,就是指在学科的某个领域中,一点一滴树立具有自己研究的新见解、新问题、新观点;创新是要在整体上的独创。确实如此,纵观历史、学术每有发展无不来之于新的批判,但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要突破上千年的陈规旧律的思想束缚,谈何容易。既需要对众多纷纭的史实进行考订和分析,又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先生也说:“我亦常困于此。”然而,另辟蹊径,确是先生治学的一大显著特点。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女真人进入中原以后,北方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终金之世中原经济一直处于残破、衰败的境地。历史教科书中,大多也是这样写的,几乎已成公论。先生在深入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批判,提出自己新的结论。指出金代的经济前后有所变化,经历了由残破转入复苏到再度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原经济发展水平不在北宋之下,东北经济发展则远远超过了辽代,达到历史上最好水平。这个分析和论证,以不可否认的史实和数字,写在他所著的《金代经济史略》一书中,奠定了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基础。这本书为著名史学前辈邓广铭先生所推重,也被学术界认为金史研究是从此书开始的。先生的论点对金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以往研究地方史,主要限于方志学,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个薄弱环节。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要我们在多年研究东北地方史和北方民族史的基础上,拓宽视角和领域,从全国的整体上研究各地的历史发展变化,从中找出地方史发展的同一性与特殊性,开展中国地方史的研究。先生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撰写发表了《中华一体论》与《中国地方史学》、《试论我国历代疆域结构与边疆政策的依据》等数篇论文,并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地方史论》一门新的专业理论基础课。1992年,又在先生的建议下,吉林大学将东北地方史研究室改为中国地方史研究室。1993年,他又与同志合作著述了一本《中国地方史论》专著,近期可望即将出版。

先生常说：“我无出人之才，全凭思考所积，有一孔之见就觉得没有白费力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现代史学研究的最新理论，它本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先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皆源自于此。现代世界，各种学派层出不穷，先生对此，既不拒之门外，也不糟粕不分，凡认为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他都积极学习吸收。先生年事虽高，与人接交并无“代沟”之嫌，他既向古人学习，也向今人学习，既向前辈学习，也向后学晚辈学习，好学之心不减当年。他在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提出来的“中华一体论”的新史学思维体系，就是这种不断学习探索的一个具体体现。他把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汉族，置于一个整体内的同等地位，从共同发展和共同意识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与“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样两个时期四个发展层次的认识。这种新的史学思维，虽然还不能说尽美尽善，但对摆脱封建史学“正闰观”的束缚与在认识上与“征服王朝论”划清界限，无疑是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生工作一丝不苟，对研究生的培养更是言传身教全心育人。我们3年的研究生生活，总是难以忘怀。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十分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学习每门功课首先要求阅读掌握基本史料，然后再扩及其他。在阅读史书时，一再要求我们注意分辨史料的真伪与价值。如学习金史时，要求我们以《金史》作为基本史料，然后扩展到《大金国志》、《松漠纪闻》、《中兴小纪》、《大金集礼》、《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宋史》、《辽史》中的有关部分，还要读一些时人笔记、行程录等等。并根据授课的内容要求阅读有关的论著，使学生了解目前研究的状态。先生虽是金史研究的

专家,从不以权威自居;在阐述自己看法的同时,总是客观地介绍有关争论问题的各种意见,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从无门户之见。

先生更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常对我们说:“搞历史研究,不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没有出息的。”要求我们至少要读几本马恩论述历史的经典著作,如果能有计划地阅读二三十本原著那就更好了。对于西方某些先进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先生也希望我们能学会分辨长短积极吸收。对于我们研究能力的提高,更是关怀备至。每门课都要求我们完成一篇习作。题目自选,选那些既新又有研究价值的题目。选好后,他便与学生一起研究文章的框架与基本思想。完成作业后,先生对每一篇习作都认真地逐字逐句进行修改。我们的毕业论文和学习期间发表的文章,无一不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的研究能力,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先生育人真诚无私,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后学同仁,他都是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以及应当查阅的资料。向研究生讲课时,不仅讲述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也谈论自己目前正在酝酿的思考。见到同志们撰写的文章因袭了他某些谈话的想法,或对他某些学术观点表示异议,他从不介意,认为扶掖后学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而学术研究只能在争论中才会有所发展。对于研究室这个集体和每个人的发展更是十分关心,带领大家完成一个又一个校级、省级乃至国家教委的科研项目。前几年盛行搞第二职业时,先生一再强调,搞学问要耐得住清苦和冷落,认定自己的追求目标就要坚持下去,切不可半途而废。一心不能二用,更不可贪图眼前的物欲,趁年轻时苦干10年,在学术上定会有所长进。1988年末,正值东北地方史研究室成立10周年,大家聚在一起。先生说今后的10年咱们也该有个规划,谈谈自己的设想和对每个人的要求。现已过去了五六年,每个人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年与会的同

锐意求索 开拓创新

——谈张博泉先生“中华一体论”的形成与结构

杨 军 韩世明

近 10 年来,我国历史研究呈前所未有的繁荣,新的科研成果层出不穷。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更多的史学工作者越来越感到,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自己新的史学研究思想,对中国以往的社会、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历史,作出切合实际的思考和总结,乃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1986 年,张博泉先生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率先提出“中华一体论”这一新的史学研究思想,随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当即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中华一体论”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张博泉先生多年潜心研究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地方史的一个结晶。早在 1980 年前,他参加撰写《东北历代疆域史》时,就已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求和思索。因为中原地区和民族与边疆地区和民族,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是研究疆域史不能不涉及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他以此为契机,终于酝酿形成并提出“中华一体论”这一新的命题。

“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概念,本来就是一体与多元思想的体现。有的学者虽然早已认识到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由众多民族组成的一个整体,但很少考虑统一就是一体,多民族就是多元,提出“统一中国”、“整个中国”等概念。但是因为古代的“中国”并不是全国的概念,是以在具体的研究中很难摆脱旧的思维方式和旧有

概念的局限,也难以得到学界的认同。至于我国在什么时候形成了统一和多民族的国家,虽在一般历史和教科书上写着自秦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仍有人认为这是在元朝统一全国以后的事实。张博泉先生凭借多年研究的心得,剖析了我国古代中原与边疆的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种种关系的发展变化和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提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于秦是正确的,但由秦至清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由秦至唐这一时期的统一,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一直是分华夷、分中外的统一。辽金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导致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大迁徙、大对流,打破了分华夷、分中外的原有统一格局。元朝又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不分华夷、不分中外的全国统一。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分布格局的大分散与小聚居的特点,就是从那时继承下来的。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并不是人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形成的。伴随着一种学术思想的形成,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探索过程。张博泉先生曾对我们一再讲:“研究是个长期积累和升华的过程。首先必须从新,不能从旧。但这个从新,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追求实事求是。其次是一个一个地不断立新,也就是一点一滴地辛勤积累,不断地充实、完善、修正自己的认识。最后才能在学科的整体上创新,形成符合历史实际的自己的研究主体思想体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1981年提出“中华一体”这一新的命题后,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继续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不但对“中华一体”这一新的命题进行哲学上的思辨和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对地方史、政权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1984年《史学集刊》发表的《宋金和战史论》,从理论上对一些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纠谬正偏,令人耳目一新。1986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的《中华一体论》,阐述了他的“一